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与空间效应研究进展

杨帆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州 510275)

摘要:伴随着全球生产方式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后工业社会”区域经济增长和城市体系重构的主导产业。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并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政治经济学视角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多层级动力机制及其区域城市化效应”的研究成果,对已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适应性进行讨论。结论为:①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时空演变态势上既呈现出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期发展阶段趋同的特征,也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②转型期政府—市场、政府—企业、中央—地方等关系,决定了政府对经济的调控程度以及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形成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动力机制。③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和集聚促进了巨型城市区域的发展,改变了城市体系的组织模式,但有别于西方的是,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效应需考虑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系的影响。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动力机制;空间效应;政府—市场关系

1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生产方式的转变和新国际劳动分工的深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Bell, 1973)。经济服务化带来了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 部分学者译为生产者服务业)的快速扩张,使其成为创造产值和吸纳就业的重要产业部门(Riddle, 1986; Daniels, 1995; Coffey, 2000; Bryson et al, 2004)。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商品或服务生产提供中间服务投入的产业,具有专业化程度高、知识密集的特点。虽然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定义比较明确,但是,其所涵盖的具体产业部门,在实证研究中存在外延上的区别。一些学者将生产性服务业等同于广告、法律、会计、计算机服务业、管理咨询等商务服务业(Hansen, 1990; Coffey et al, 1996; Airolti et al, 1997);一些学者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及商务服务业(Gillespie et al, 1987; Hutton et al, 1987; Beyers, 1991);而 Sassen

(2001)等则将交通、仓储、通讯等产业部门也纳入生产性服务业。此外,“高级生产性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s)、“专业服务业”(professional services)等概念,也被应用于描述信息和知识程度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部门(Daniels et al, 1991)。

生产性服务业趋向于在大都市区和中心城区集中分布,其区位特征和地域差异使其成为“导致区域发展差异的新因素”(Moyart, 2005)。作为“后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发展机制及其对区域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和城市地理学家关注的热点议题。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在经济运行和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中国2000年以来“第四波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叶嘉安等, 2006)。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显示,以企业数和从业人员来衡量,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分别从

收稿日期:2018-03-12;修订日期:2018-05-3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01181)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301181]。

作者简介:杨帆(1977-),女,广东惠来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服务业地理学研究, E-mail: yangfan25@mail.sysu.edu.cn。

引用格式:杨帆. 2018.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与空间效应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37(6): 750-760. [Yang F. 2018. Progress of research on the growth dynamics and spatial effects of producer service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7(6): 750-760.]. DOI: 10.18306/dlkxjz.2018.06.002

2004年的13.3%和11.1%上升到2013年的20.4%和13.4%(中国国家统计局,2006,2015)。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和集聚对中国工业化背景下的经济空间和城市体系组织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需要深入和全面地了解这一经济地理现象。

本文在追踪国内外前沿研究的基础上,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与空间效应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进展进行归纳和总结,并立足中国的经济政治环境,探讨已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政治经济学视角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多层级动力机制及其区域城市化效应”(项目批准号:41301181)的资助下,项目组成员进行了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本文按照“模式—机制—效应”的思路,主要讨论以下三个研究议题: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和空间格局,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空间效应。

2 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和空间格局

2.1 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和区位特征

1980年代以来,随着“福特主义”(Fordism)危机的出现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幅度增长和空间集聚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最为重要的经济地理现象之一。诸如“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Bell, 1973)、“服务社会”(service society)(Illeris, 1996)、“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Castells, 1996)、“服务世界”(service worlds)(Bryson et al, 2004)等许多概念相继被提出,用于描述和解释西方国家服务业增加和制造业下降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和新机制。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学者们主要归因于新国际劳动分工以及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变化催生的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增长及其外部化趋势。

“后福特经济”市场需求的日益碎片化和多变性,使得“福特经济”大规模、批量化的生产方式和垂直一体化的组织模式逐渐被小规模、定制化的生产方式和以柔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为特征的水平型组织模式所取代。竞争的主要方式逐渐从价格竞争转向产品的差异化和创新性。与此同时,生产活动组织的地理范围从国家向全球范围扩展,加剧了企业内部管理的复杂性以及企业运营的风险性。研发、金融、设计、咨询、广告等生产性

服务业活动在产品开发、技术支持、企业融资、高效管理、市场开拓、风险规避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使其成为发达国家增长最快的产业部门(Coffey et al, 1992; Bryson et al, 2004)。1971-1991年20年间,加拿大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增长了185%,而同期的总就业增长仅为65%,制造业的增长仅为22%(Coffey, 1996)。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也与其外部化趋势紧密相关。虽然生产性服务可以由企业内部提供,但是,一方面从外部购买可以降低成本和规避范围不经济(diseconomies of scope),有利于企业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以维持核心竞争力(Rothwell, 1992; Monnoyer et al, 2007);另一方面,面对市场和技术的快速变化和复杂性,企业自身的知识和技术局限也促使其购买大量的外来服务(Lindahl et al, 1999; Wood, 2005)。美国采购协会(American Purchasing Society)199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年收入在8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生产性服务业的外部采购占全部外部采购费用的70%以上(刘曙华等, 2010)。

相较于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格局呈现出更加不均衡的特征(Moyart, 2005)。在城市间层面,生产性服务业集中分布在大都市区(Coffey et al, 1997);在城市内部,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聚在中央商务区(CBD)和中心城区(Coffey et al, 1996)。近年来,对西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演变的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从大都市区向低等级城市、以及从中心城区向外围区域转移的趋势(Gong, 2001; Hermelin, 2007)。恐怖主义威胁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转移的趋势。Gong等(2012)的研究表明,“9·11”事件之后,曼哈顿的金融服务业外迁趋势明显,仅在2001-2004年的3年间,曼哈顿金融服务业占纽约的比重就从55.1%下降至51.7%。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生产性服务业的离心化趋势导致了大都市区和CBD一定程度的流失量,但并没有动摇这些区位的核心地位。

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1990年代以来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相关分析指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虽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的速度较快,但发展水平仍然偏低(刘曙华等, 2010)。除全球化和市场化等经济力量外,中国政府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过程中也发挥重要作用(Lin, 2004; Wang, 2009; 杨帆等, 2013)。空

间格局方面,与西方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和分散并存的发展态势不同,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间层面和城市内部均处于向心化的空间集聚阶段(Han et al, 2009; Yi et al, 2011; Yang et al, 2013)。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时空演变态势上既呈现出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期发展阶段趋同的特征,也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因此,已有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不仅提供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参考,也进行了具有中国服务业地理学特色的理论探索。

2.2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关系

作为在专业化的基础上从工业生产体系中分离出来的产物,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关系是服务业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传统的理论认为,制造业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服务业产出的重要需求部门,服务业部门的发展必须依靠制造业的发展,其空间格局也依属于制造业的分布(Hansen, 1990; Illeris, 1996)。“福特主义”危机出现后,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进程和经济转型,使得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空间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联系逐渐弱化,其原因主要有:第一,生产性服务业独立于制造业,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部门(Urry, 1987; Guerrieri et al, 2005);第二,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结构发生转变,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联系逐渐松弛,生产性服务业更多地被用作服务生产的中间投入(Goe, 1990; Beyers et al, 1996a)。Goe(1994)指出,工业化时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由制造业部门驱动的;后工业化时期,则是服务业部门在起决定性作用。

近年来,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关系演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作为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投资的目的地,这些国家经济结构的演变不同于后工业化国家从农业向制造业进而向服务业转移的“线性”模式,而是制造业与服务业并行发展(Lin, 2004; Daniels et al, 2005)。生产性服务是制造业生产的中间投入要素之一,也是制造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得以提高的关键,二者存在紧密的投入—产出关系。通常上下游垂直联系的产业,理论上趋向于集中布局,以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Ottaviano et al, 1998; Amiti, 2001)。虽然西方的

经验表明,随着产业联系的变化,生产性服务业趋向于集中在大都市区,但其中许多生产性服务业中心也是传统的工业腹地(Noyelle et al, 1984)。城市工业基础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初期对其空间分布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化(tertiarization)共同作用下,发展中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与制造业的关联程度如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独特的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模式,为这一研究议题提供了难得的实证案例。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争论,一些学者论证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同一城市或邻近城市的协同效应(Ke et al, 2014),一些学者则认为制造业集聚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没有影响(陈建军等, 2009)。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关联,项目组进行的相关研究(Yeh et al, 2017)^①表明,在城市和区县层面,生产性服务业有着与制造业不同的区位需求,没有随着制造业进入其产业空间。进一步研究指出,分析单元对准确把握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关系的重要性,由于生产性服务能被长距离销售并且具有区域导向的特征,应该跳出行政单元的限制,在区域层面进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关系的分析。

3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

3.1 西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的理论解释

对于生产性服务业不均衡发展的空间格局,学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首先,基于传统的区位分析思路,一些学者开展了对生产性服务业地理空间的研究,从企业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总结了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和区位选择的因素(Daniels, 1985; Moulaert et al, 1995; Illeris, 1996),包括:①与接近性相关的因素,如接近客户、信息源、劳动力市场等;②与通达性相关的因素,包括交通、信息基础设施条件等;③与环境相关的因素,包括区位知名度、社会和居住环境、办公设施条件、市场环境状况等;④与决策者个人相关的因素,如个人区位喜好、居住习惯等。

其次,越来越多区域中观层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从节约生产交易成本和集聚经济等“外部经济性”效应的角度来解释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特征(Coffey et al, 1992; Goe et al, 2000)。后福特制

^①Yang F F, Yeh A G O, Wang J, et al. Forthcoming. Regional effects of producer services on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in China[J]. Applied Geography.

生产体系的兴起使得产业组织的社会分工程度不断加深,在此背景下,由于生产性服务业最重要的特征是服务使用者和提供者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因此接近客户的需求使得生产者服务业呈现出明显的集聚倾向(Moulaert et al, 1991; Goe et al, 2000)。与客户和其他企业紧密的前后向联系使得生产性服务业能在技术和价格方面保持市场竞争力,同时也有利于对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作出灵活的应对。

第三,与强调企业投入产出联系和交易结构的集聚理论不同,近年来兴起的新区主义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主要从信息和知识交流以及企业创新的角度来理解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格局。这种观点指出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并不仅仅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而主要是出于“集体学习”(collective learning)和获取行业内隐形知识(tacit knowledge)的考虑(Isaksen, 2004)。而后者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习俗、合作传统、行为规范、信用体系等非交易型的相互依赖性(non-traded interdependence)和地方化的关系型资本(relational capital)(Wood, 1996; Keeble et al, 2002)。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一方面,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为了增强其控制能力和决策的及时性、正确性,通常需要和别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进行频繁的面对面交流,向中心城市的CBD集中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使得一些不需要与客户保持密切联系、高度标准化的生产性服务业活动和功能逐渐向中小城市或大城市郊区分散(Gong, 2001; Coffey et al, 2004; Han et al, 2009)。西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和理论为理解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提供了丰富的借鉴。然而,已有理论解释大多关注产业集群、空间集聚效应和地方化的生产网络等市场机制的影响,相对忽视了政府这一非市场化的行为主体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演变中的重要性。Coe等(1998)指出,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区域集聚环境和创新氛围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政府、企业以及其他市场行为主体经过长期的“循环累积”(cumulative causation)的历史过程共同造就的。特别是在中国的转型体制下,对政府角色和作用的研究不足不利于深入理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本质和内涵。学者们探讨了西方理论的适用性,并基于中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相关理论。

3.2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

随着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兴起,众多学者运用西方理论来解释其发展和区位空间差异(赵群毅等, 2007; 邵辉, 2008; 申玉铭等, 2009)。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在理解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独特性时“水土不服”,即使是与西方国家趋同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演变趋势,其影响机制也不能完全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产业活动的空间决策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土地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完善、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产业空间的规划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政府的参与和支持。在一些市场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性服务业部门,政府还可能以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直接干预行业的发展。中国政府同时扮演着管治者、市场参与者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等多重角色(Ma, 2002)。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将政府的政策和行为纳入分析框架,揭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动力机制。

第一,政企关系对企业区位特征的影响。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国有企业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积极推进和深化国企改革,但其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以信息咨询业为例,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将北京、上海和沈阳作为试点城市,相继创立科技咨询服务部(公司),以满足发展市场经济带来的咨询需求(李靖, 2001)。政府不仅大大简化咨询企业设立的程序和降低行业进入门槛,也直接参与行业发展。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显示,信息咨询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数量占总企业数的1/4(中国国家统计局, 2003)。这些企业的区位往往直接由政府决定。其中,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为提高政治体制运行效率”而设立、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的事业单位(Zhang, 2000),既与政府有紧密的行政从属联系,又以企业的身份直接参与市场竞争。一方面,凭借与政府的联系,他们更容易获得关键的经济和政策信息,更具竞争力(Lin et al, 2012);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较强的经济实力及其对外部生产性服务的大量需求,使其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的直接影响因素。在服务业地理研究中,跨国企业作为主要客户,对生产性服务业区位

的重要影响经常被强调,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与跨国企业的联系嵌入全球生产网络(Keeble et al, 2002; Aslesen et al, 2007; Jacobs et al, 2013)。通过对珠江三角洲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演变的研究发现,接近大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对新增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均有正向影响,并且国有企业的影响比外资企业更大(Wang et al, 2016)。

第二,不同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动力具有明显差异。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经济的干预程度,直接影响进行生产性服务生产的资源和信息投入的可获得性以及市场的竞争生态和“游戏规则”。因此,基于西方经验总结的影响机制,在中国的适用性需要充分探讨。Lin等(2012)发现,由于中国对关键信息的控制,“专业信息的可获得性”成为北京吸引信息咨询业企业进驻最重要的因素,占被访企业的24.8%;而在广州,仅2.8%的被访企业认为这是影响其区位选择最重要的因素。此外,西方研究中“接近同行业企业有利于通过竞争和合作促进创新”,“行业协会在规范市场、设立行业专业标准、提供市场信息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等影响机制,在中国信息咨询业空间发展中的效应并不明显;相反,政治和社会关系等相对被忽视的因素,对中国信息咨询业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与西方国家相似的集中分布和不均衡发展的演变特征和趋势,但是,不同的发展水平以及根植于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对其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第三,政府政策和行为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形成的直接作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以单位为基本组织单元,工业和居住用地混合,商业设施较为匮乏。1988年中国政府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改革,在土地市场化的作用下,“新城市空间”不断涌现,尤其是新商务区的出现,引发了城市景观最显著的变化(Ma et al, 2005)。Yi等(2011)对广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演变分析表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CBD建设、“住禁商”等政策是如何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格局的。CBD是城市内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最重要的区位,然而,与西方城市不同,中国城市的CBD大多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城市规划的产物。正如Han等(2009)所指出的,中国政府通过在区域层面设立政策特区、在城市层面发展工业园和办公区直接影响产业活动的

区位。

Kloosterman(2010)认为,不同的经济基础和制度框架会产生一个个独特的“滤器”(filter),这些“滤器”常常表现出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的特征,影响产业发展在具体地域的表现形态。中国的研究表明,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空间格局的研究,有必要拓展对地方经济政治环境的认识。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和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同时,在转型期背景下,政府—企业、中央—地方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因此,应该从政府和市场互动的视角,探讨企业、部门、城市区域、国家政策、全球网络联系等多层级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实际效应。在此基础上进而分析中国1949年以来政府对市场从“内部化”向“外部化”逐步转变的历程及其带来的经济转型和城市空间变化(Yeh et al, 2015a)。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以及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形成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同的动力机制,为此,需要从政治经济基础出发,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服务业地理学发展理论。

4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空间效应

4.1 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作用

西方文献中,生产性服务业被标榜为“企业层面对抗福特主义危机的胜利者”“柔性生产与分配体系的创造者”“新技术与战略挑战的斡旋者”(Moulaert et al, 1995)。生产性服务业对西方国家内部不同经济层面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①生产性服务业是1970年代制造业活动转移后城市和区域就业、收入、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城市和区域经济复兴的重要推动力(Coffey, 2000);②生产性服务业属于城市经济活动的“基本部分”,不仅是全球经济时代贸易流的重要部分,也通过与本地产业的联系产生积极的乘数效应(Illeris, 1996);③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与产品生产和其他服务活动的复杂联系,对区域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提升发挥很大的作用(Hutton, 2005)。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不均衡发展的空间布局,其所在的城市或区域,在经济发展中具有明显的优势。Bourne(1991)指出,无法从制造业经济升级到服务经济或高新技术产业的城市,将面临衰败的局面。在全球层面,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形成了“世界城市”(world city)和“全球城市”

(global city),集中了控制和指挥世界经济的各种职能(Friedmann et al, 1982; Sassen, 2001)。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新兴产业部门,也带来了深刻的城市化效应,引起了城市体系的重组,城市体系结构的重心逐渐从中小城市转向大城市(Lin, 2002)。1980、1990年代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形成了大批中小城市,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然而,得益于其集聚经济和都市环境的优势,大城市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首选区位而成功“复位”(reposition)。改革开放后,东莞、中山等工业城市的崛起,严重影响了广州中心城市的地位,其工业总产值占区域的比重从1992年的48.2%下降至2003年21.7%;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则稳步增加,2000-2003年期间从33.2%上升至35.1%(Yang et al, 2007)。通过城市职能和区域分工的转变,广州重新明确了在区域经济的中心地位。

综合考虑生产性服务的输出功能以及中心地理论,生产性服务业不仅对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也对所在区域的发展产生重要作用。除作为重要的经济部门直接创造产值和就业外,生产性服务业还通过服务投入以及营造创新环境(innovative milieu),促进其他经济活动的技术和产品创新(Bailly et al, 1987; 江静等, 2007)。创新环境的营造具有空间邻近性特征,其效应的发挥主要集中于所在城市;而服务投入则可通过服务输出作用于周边城市,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MacPherson (1997)的研究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制造业的生产率 and 创新能力也较高;反之亦然。针对当前实证研究主要以城市为分析单元,项目组探讨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区域溢出效应,并划分了主要生产性服务业中心的市场服务范围^①。该项研究也进一步支持了前述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联系的判断,揭示了二者在区域层面的“协同效应”(synergy effect)。

4.2 生产性服务业与巨型城市区域

城市区域研究的萌芽思想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霍华德编著的《明天: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主张将城市周边地域的城镇纳入城市规划的考虑范围(引自顾朝林,2009)。19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深刻而全面地作用于世界城市化进程,不仅带来了大城市尤其是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的迅速发展,在区域范围内,

还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和“巨型城市区域”(mega-city region)(Scott, 2001; Hall et al, 2006)。在这些巨型城市区域中,城市间经济要素与人员等交流频繁,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结合起来,形成多极多层次的城市网络。

巨型城市区域被认为是当前世界经济运行最具竞争力的地域单元。Hall(1999)最初在东亚地区定义了巨型城市区域,包括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日本的东海道(东京—大阪)走廊以及大雅加达等地。这一概念之后被应用于分析欧洲的区域城市体系组织(Hall et al, 2006)。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组织全球金融和信息流动以及促进全球资本扩张最重要的产业部门,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巨型城市区域发展的重要机制。已有的研究表明,巨型城市区域的特征主要包括多中心性(polycentricity)、功能性和网络性三个方面,而这三个分析维度都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紧密相关。第一,生产性服务业在区域中的多中心分布是巨型城市区域多中心性形成最重要的因素之一(Hoyler et al, 2008);第二,巨型城市区域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承担节点功能,区域中各个“功能性城市区”(functional urban region)是由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各种实体流和信息流联系成一体的(Hanssens et al, 2013);第三,除实体的交通等基础设施网络外,不同生产性服务功能上的分工与互补形成的联系,也是巨型城市区域功能联系网络的重要构成要素(Lüthi et al, 2010)。因此,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内部办公网络联系的“联锁网络模型”(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成为界定巨型城市区域和分析区域城市之间“关联网”最具影响力的模型(Taylor, 2001, 2004)。

借助全球化的力量,中国城市和区域发展陆续出现了“都市区化、都市区连绵化、连绵区巨型化的趋势”(于涛方, 2015)。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转型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巨型城市区域的概念和分析方法被应用于衡量中国巨型城市区域形成和发育的成熟程度(陆珏等, 2010)。例如,文余源等(2015)识别出10个巨型城市区域,包括3个初步形成的巨型城市区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4个正在崛起的巨型城市区域,以及3个潜在发展的巨型城市区域。项目组着重分析了珠三角巨型城市区域生产性服务业网络联系对区域城市的联结情况(Yeh et al, 2015b)。由于“形成网络的企业”并不仅仅局限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内部机构,也包括产

业链上的不同企业(Lüthi et al, 2010),因此,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不仅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内部办公网络,也将企业的外部业务网络联系纳入分析框架。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下,珠三角的城市体系组织出现了与工业化背景不同的发展模式:①珠三角的制造业以出口导向型为主,其产品生产和销售涉及的主要是区域的外向联系,而生产性服务业更倾向于服务区域市场。②生产性服务业联系具有等级结构的特点以及偏好中心城市的外向联系特征,而工业联系则涉及不同规模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下的城市化进程,营造了新的空间秩序,重塑了中国城市区域的空间建构和功能组织。

5 结论与展望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中国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发展高附加值和高增长率的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各地区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现实选择和重要途径。结合中国转型期的特殊环境,系统和深入地了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规律,对中国经济转型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决策指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已有生产性服务业研究的丰硕成果,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空间效应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理论解释进行了梳理,并结合中国的实证经验探讨了这些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主要结论为:①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时空演变态势上既呈现出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期发展阶段趋同的特征,也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②转型期政府—市场、政府—企业、中央—地方等关系,使得基于西方经验建立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动力机制的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需要充分探讨;③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和集聚促进了大城市和巨型城市区域的发展,改变了工业化背景下的经济空间格局和城市体系组织模式;与西方研究不同的是,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效应需考虑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系的影响。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交通基础设施和技术条件的进一步提升,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命题。

第一,高铁时代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发展的新格局。已有研究表明,交通条件的改善可使生产性服务业更加灵活地进行布局,使其既保持与中心城市的社会联系,又享受中心城市周边地区低成

本、环境舒适等优势。因此,交通条件的变化往往会引起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重组,具有向郊区和小城市扩散的趋势(Beyers et al, 1996b)。2008年京津城际列车通车,中国铁路正式迈入“高铁时代”,截至2016年底,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已达2.2万km。高铁快速、大容量的特点大大地提高了城市之间的可达性,对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的高铁网络是世界上线路最长、覆盖地域范围最广的高铁项目,高铁发展带来的交通可达性的提升如何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发展?需要从不同的尺度层面研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的演变。

第二,政府和市场互动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新动力机制。政府—市场关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态(Block, 1994)。中国经济仍处于转型期,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和政治体制的完善,政府将进一步外部化各类要素市场,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也将发生变化。新时期政府—市场关系的进一步演变,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空间行为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应持续关注经济和体制发展产生的新机制,立足于中国的经验,推动相关理论的发展。

第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背景下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变趋势。作为主导产业,生产性服务业趋于集中分布的空间需求直接导致了后工业经济区域间的发展差异。然而,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其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关系,使生产性服务业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效应相对复杂化。生产性服务业对区域的溢出效应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通过服务输出,生产性服务业能对中小城市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发挥作用,促进这些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引导下,地价、劳动力成本以及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调整等因素可能对大城市特定的第二、三产业产生“挤出”效应,为区域低等级城市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最终区域空间经济格局的演变是趋向“极化”或是“扁平化”,尚需要深入的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陈建军, 陈国亮, 黄洁, 等. 2009.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来自中国222个城市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4): 83-95. [Chen J J, Chen G L, Huang J. 2009.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determinants of producer service agglomeration: Evidence from

- 222 Chinese cities[J]. *Management World*, (4): 83-95.]
- 顾朝林. 2009. 巨型城市区域研究的沿革和新进展[J]. 城市问题, (8): 2-10. [Gu C L. 2009. Progress of mega-city region research[J]. *Urban Problems*, (8): 2-10.]
- 江静, 刘志彪, 于明超, 等. 2007. 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效率提升: 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世界经济, (8): 52-62. [Jiang J, Liu Z B, Yu M C. 2007.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s and improvement in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regional and sectoral panel datasets[J].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8): 52-62.]
- 李靖. 2001. 咨询业在中国[M]. 北京: 企业管理出版社. [Li J. 2001. Consulting services in China[M]. Beijing, China: Enterprise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 刘曙华, 沈玉芳. 2010. 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J]. 创新, (6): 64-68. [Liu S H, Shen Y F. 2010. Developing situation and tendency of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ies at home and abroad[J]. *Innovation*, (6): 64-68.]
- 陆毗, 汤茂林, 唐丽芳, 等. 2010. 世界城市区域网络中的我国巨型城市区域[J]. 现代城市研究, 25(9): 81-89. [Lu P, Tang M L, Tang L F, et al. 2010. Chinese mega-city region in the global city-city network[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5(9): 81-89.]
- 邵晖. 2008. 北京市生产者服务业聚集特征[J]. 地理学报, 63(12): 1289-1298. [Shao H. 2008. Agglomer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Beijing[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3(12): 1289-1298.]
- 申玉铭, 邱灵, 尚于力, 等. 2009. 京沪生产性服务业比较研究[J]. 地理研究, 28(2): 441-450. [Shen Y M, Qiu L, Shang Y L, et al. 2009.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producer services between Beijing and Shanghai[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8(2): 441-450.]
- 文余源, 于俊雅. 2015. 中国巨型城市区的识别与格局[J]. 中州学刊, (11): 30-36. [Wen Y Y, Yu J Y. 2015. Defini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mega-city regions in China[J].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11): 30-36.]
- 杨帆, 叶嘉安. 2013.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空间分布[J]. 热带地理, 33(2): 178-186. [Yang F, Yeh A G O. 2013. Growth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China[J]. *Tropical Geography*, 33(2): 178-186.]
- 叶嘉安, 徐江, 易虹, 等. 2006. 中国城市化的第四波[J]. 城市规划, 30(S1): 13-18. [Yeh A G O, Xu J, Yi H. 2006. The forth wave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J]. *City Planning Review*, 30(S1): 13-18.]
- 于涛方. 2015. 中国巨型城市地区: 发展变化与规划思考[J].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7(1): 16-67. [Yu T F. 2015. Development of China's mega-city regions and the planning reflection[J].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7(1): 16-67.]
- 赵群毅, 周一星. 2007. 北京都市区生产者服务业的空间结构—兼与西方主流观点的比较[J]. 城市规划, 31(5): 24-31. [Zhao Q Y, Zhou Y X. 2007. Spatial structure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J]. *City Planning Review*, 31(5): 24-31.]
- 中国国家统计局. 2003. 中国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汇编[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China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2003. China second national census of basic units[M]. Beijing, China: China Statistics Press.]
- 中国国家统计局. 2006.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004[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China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2006. China economic census yearbook 2004[M]. Beijing, China: China Statistics Press.]
- 中国国家统计局. 2015.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013[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China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2015. China economic census yearbook 2013[M]. Beijing, China: China Statistics Press.]
- Airoldi A, Janetti G B, Gambardella A, et al. 1997. The impact of urban structure on the loc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J].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17(1): 91-114.
- Amiti M. 2001. Location of vertically linked industries: Agglomeration versus comparative advantage[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9(4): 809-832.
- Aslesen H W, Jakobsen S E. 2007. The role of proximity and knowledge interaction between head offices and KIBS[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98(2): 188-201.
- Bailly A S, Maillat D, Coffey W J. 1987, et al. Service activiti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ome European example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5): 653-668.
- Bell D.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M]. New York: Basic Books.
- Beyers W B. 1991. Trends in the producer services in the USA: The last decade[M]//Daniels P W. Services and metropolitan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46-172.
- Beyers W B, Lindahl D P. 1996a. Explaining the demand for producer services: Is cost-driven externalization the major factor[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75(3): 351-374.
- Beyers W B, Lindahl D P. 1996b. Lone eagles and high fliers in rural producer services[J]. *Rur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11: 2-10.
- Block F. 1994. The roles of the state in the economy[M]//Smelser N J, Swedberg R.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691-710.
- Bourne L S. 1991. Recycling urban systems and metropolitan areas: A geographical agenda for the 1990s and beyond[J].

- Economic Geography, 67: 185-209.
- Bryson J R, Daniels P W, Warf B, et al. 2004. Service worlds: People, organisations, technologies[M]. London, UK: Routledge.
- Bourne L S. 1991. Recycling urban systems and metropolitan areas: A geographical agenda for the 1990s and beyond[J]. Economic Geography, 67: 185-209.
- Castells M. 1996.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M]. Oxford, UK: Blackwell.
- Coe N M, Townsend A R. 1998. Debunking the myth of localized agglomer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a regionalized service economy in South-East England[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3(3): 385-404.
- Coffey W J. 1996. 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s of producer-services establishments: Evidence from the Montreal metropolitan area[J]. Urban Geography, 17: 604-632.
- Coffey W J. 2000. The geographies of producer services[J]. Urban Geography, 21(2): 170-183.
- Coffey W J, Bailly A S. 1992. Producer services and systems of flexible production[J]. Urban Studies, 29(6): 857-868.
- Coffey W J, Drolet R, Polese M, et al. 1996. The intrametropolitan location of high order services: Patterns, factors and mobility in Montreal[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75(3): 293-323.
- Coffey W J, Shearmur R G. 1997. The growth and location of high order services in the Canadian urban system, 1971-1991[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9: 404-418.
- Coffey W J, Shearmur R G. 2004. The growth and location of high order services in the Canadian urban system, 1971-1991[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9(4): 404-418.
- Daniels P W. 1985. Service industries: A geographical appraisal[M]. London, UK: Methuen.
- Daniels P W. 1995. The locational geography of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 firms in the United Kingdom[J]. Progress in Planning, 43(2-3): 123-138.
- Daniels P W, Ho K C, Hutton T A, et al. 2005. Service industries and Asia-Pacific cities: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M]//Daniels P W, Ho K C, Hutton T A. Service industries and Asia-Pacific cities: New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London, UK: Routledge: 1-18.
- Daniels P W, Moulaert F W. 1991. 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M]. London, UK: Belhaven.
- Friedmann J, Wolff G. 1982. World city formation: 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6(3): 309-344.
- Gillespie A E, Green A E. 1987. 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producer services employment in Britain[J]. Regional Studies, 21(5): 397-411.
- Goe W R. 1990. Producer services, trade and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J]. Regional Studies, 24(4): 327-342.
- Goe W R. 1994. The producer services sector and development within the deindustrializing urban community[J]. Social Forces, 72(4): 971-1009.
- Goe W R, Lentnek B, MacPherson A, et al. 2000. The role of contact requirements in producer services location[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2(1): 131-146.
- Gong H. 2001. A hierarchical change model of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J]. Urban Geography, 22: 340-359.
- Gong H, Keenan K. 2012. The impact of 9/11 on the geography of financial services in New York: A few years later [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64(3): 370-388.
- Guerrieri P, Meliciani V. 2005.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16(4): 489-502.
- Hall P. 1999. Planning for the mega-city: A new eastern Asian urban form[M]//Brotchie J, Newton P, Hall P. East west perspectives on 21st century urban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Eastern and Western cities in the New Millennium. Aldershot: Ashgate: 3-36.
- Hall P, Pain K. 2006. The polycentric metropolis: Learning from mega-city regions in Europe[M]. London, UK: Earthscan.
- Han S S, Qin B. 2009.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Shanghai[J]. Urban Studies, 46(4): 877-896.
- Hansen N. 1990. Do producer services induc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30(4): 465-476.
- Hanssens H, Derudder B, Aelst S V, et al. 2014. Assessing the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of the mega-city region of central Belgium based on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transaction links[J]. Regional Studies, 48(12): 1939-1953.
- Hermelin B. 2007. The urbanization and suburbanization of the service economy: Producer services and specialization in Stockholm[J]. Geografiska Annaler: Human Geography, 89: 59-74.
- Hoyler M, Freytag T, Mager C, et al. 2008. Connecting Rhine-Main: The production of multi-scalar polycentricities through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J]. Regional Studies, 42(8): 1095-1111.
- Hutton T A. 2005. Services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and policy innovation[M]. Daniels P W, Ho K C, Hutton T A. Service indus-

- tries and Asia-Pacific cities: New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52-76.
- Hutton T A, Ley D. 1987. Location, linkages, and labor: The downtown complex of corporate activities in a medium size city,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J]. *Economic Geography*, 63(2): 126-141.
- Illeris S. 1996. The service economy: A geographical approach [M]. Chichester, UK: Wiley.
- Isaksen A. 2004. Knowledge-based clusters and urban location: The clustering of software consultancy in Oslo[J]. *Urban Studies*, 41(5-6): 1157-1174.
- Jacobs W, Koster H R A, van Oort F, et al. 2013. Co-agglomeration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4(2): 443-475.
- Ke S, He M, Yuan C, et al. 2014. Synergy and co-agglomer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A panel data analysis of Chinese cities[J]. *Regional Studies*, 48(11): 1829-1841.
- Keeble D, Nachum L. 2002. Why do business service firms cluster? Small consultancies, clustering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London and southern England[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7(1): 67-90.
- Kloosterman R C. 2010. This is not America: Embedding the cognitive-cultural urban economy[J].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2010, 92(2): 131-143.
- Lin G C S. 2002. The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of Chinese cities: A contextual and geographic analysis[J]. *Cities*, 19(5): 299-316.
- Lin G C S. 2004. Toward a post-socialist city? Economic tertiarization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the Guangzhou metropolis, China[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45(1): 18-44.
- Lin G C S, Yang F F, Hu F Z, et al. 2012. The new geography of information and consulting services in China: Comparing Beijing and Guangzhou[J]. *Habitat International*, 36(4): 481-492.
- Lindahl D P, Beyers W B. 1999. The creation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by producer service firms[J]. *Economic Geography*, 75(2): 1-20.
- Lüthi S, Thierstein A, Goebel V. 2010. Intra-firm and extra-firm linkages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The case of the emerging mega-city region of Munich[J]. *Global Networks*, 10(1): 114-137.
- Ma L J C. 2002.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1949-2000: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4(9): 1545-1569.
- Ma L J C, Wu F L. 2005. Restructuring the Chinese city: Diverse processes and reconstituted spaces[M]//Ma L J C, Wu F L. *Restructuring the Chinese city: Changing society, economy and space*. New York: Routledge: 1-20.
- MacPherson A. 1997. The role of producer service outsourcing i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New York State manufacturing firm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7(1): 52-71.
- Monnoyer M C, Zuliani J M. 2007.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Airbus production and services[J].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7: 251-262.
- Moulaert F, Chikhaoui Y, Djellal F, et al. 1991. Locational behavior of French hi-tech consultancy firm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5(1): 5-24.
- Moulaert F, Djellal F. 1995.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sultancy firms: 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 from a wide-area perspective[J]. *Urban Studies*, 32(1): 105-122.
- Moulaert F, Todtling F, Schamp E, et al. 1995. The role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J]. *Progress in Planning*, 43(2-3): 107-121.
- Moyart L. 2005. The role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What opportunities for medium-sized cities in Belgium[J].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5(2): 213-228.
- Noyelle T J, Stanback T M. 1984.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ities[M]. Totawa, NJ: Rowman & Allanheld.
- Ottaviano G I P, Puga D. 1998. Agglomer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A survey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J]. *World Economy*, 21(6): 707-731.
- Riddle D. 1986. Service-led growth: The role of the service sector in world development[M]. New York: Praeger.
- Rothwell R. 1992. Successful industrial innovation: Critical factors for the 1990s[J]. *R & D Management*, 22: 221-239.
- Sassen S. 2001. The global city 2nd edition[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A J. 2001. Global city-regions: Trends, theory, policy [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P J. 2001. Specification of the world city network[J]. *Geographical Analysis*, 33(2): 181-194.
- Taylor P J. 2004. World city network: A global urban analysis [M]. London, UK: Routledge.
- Urry J. 1987. Some social and spatial aspects of service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5(1): 5-26.
- Wang E. 2009. The service sector in the Chinese economy: A geographic appraisal[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50(3): 275-300.
- Wang J J, Zhang X, Yeh A G O. 2016. Spatial proximity and location dynamics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in

-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J]. *Habitat International*, 53: 390-402.
- Wood P A. 1996. Business services, the management of chang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K: A corporate client perspective[J]. *Transactions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1(4): 644-665.
- Wood P. 2005. A service-informed approach to regional innovation—or adaptation[J].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5(4): 429-445.
- Yang F F, Lin G C S. 2007. State, market and the growth of service industries in metropolitan Guangzhou[M]//Daniels P W, Harrington J W. *Servi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sia-Pacific*. Aldershot: Ashgate: 105-119.
- Yang F F, Yeh A G O. 2013. Spatial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the Chinese urban system[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5: 159-179.
- Yeh A G O, Yang F F, Wang J J, et al. 2015a.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J]. *Urban Studies*, 52(15): 2822-2848.
- Yeh A G O, Yang F F, Wang J J, et al. 2015b. Producer service linkages and city connectivity in the mega-city region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J]. *Urban Studies*, 52(13): 2458-2482.
- Yeh A G O, Yang F F, Xu Z, et al. 2017. Will rural urbanization produce a new producer service space in China[J]. *Habitat International*, 67: 105-117.
- Yi H, Yang F F, Yeh A G O, et al. 2011. Intraurban loc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 in Guangzhou, Chin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3: 28-47.
- Zhang W. 2000. *Transforming China: Economic reform and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s*[M]. London, UK: Macmillan.

Progress of research on the growth dynamics and spatial effects of producer services

YANG Fan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shift from Fordist to post-Fordist production, producer services have replaced manufacturing as the central activities in shaping regional economies and reorganizing the city systems of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Based on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an elaboration of the deliveries of the project "A study of the multi-scalar growth dynamics of producer services and its urbanization effects: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existing theories when they are used to understand the growth dynamics of producer services and its spatial effects in China. The main findings include: (1) producer services development shows similar pattern to that in the West, but exhibits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2) due to the distin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the state and enterprises, and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existing theories and explanations,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the Western experiences, have yielded important insights but at the same time show limitations to account for the uneven growth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China; and (3) the dramatic expans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has led to the rapid growth of large cities and the emergence of mega-city regions, which have reshaped the economic space and reorganized the urban system in China. However, different from its Western counterparts, the spatial effects in China need to consider the impacts from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 words: producer services; growth dynamics; spatial effects; state-market relation